

综合大学的基础文科改革思考

○ 潘显一

(四川大学 社科处,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综合大学的人文学科,因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性、学科结构传统而老化、以及文科学科分工而分家等原因,发展滞后。充分认识和发挥人文学科的学术文化优势,国家和高校采取保护和扶持政策,在学科及其学术评价上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是促进人文学科改革发展的重要办法。同时,人文学科增强自身的“精品意识”,加强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融会,使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横向合作与联合攻关,也是人文学科自我更新和提高的积极办法。

〔关键词〕大学;人文学科;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4)-01-0025-06

综合大学的那些传统的、基础的非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如文学、史学、哲学等,多半是人文学科、文化类研究,我们名之为老文科者,以区别于新兴的、交叉的、应用性的学科、专业。在综合大学特别是文理为重点的综合大学,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往往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有“泰斗”级专家掌舵,专著、论文车载斗量,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该校文科甚至整个学校的学术地位。但是,应该看到,面临当前综合大学的改革,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却也显得迟缓被动、处境尴尬、困难重重、发展滞后。选题内容老化,研究方法陈旧;研究生招生难,“分配”找工作也难;教师研究人员的收入低,又往往没有“兼职”和生财之道;系所人员教学科研任务不饱和,又苦于没法减员分流;高层次人才没法进,自己的骨干还被挖走;基础研究课题有限,现实问题又

作者简介:潘显一,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

搞不了等等。总之,这些学科专业老化,捉襟见肘,缺乏活力,真是不办又不行,办又办不好;想改改不动,不改也不行。面对社会、现实的急遽变化和需要,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原因思考

认真分析一下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学科陷入困境的原因,对于综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改革发展,对于整个综合大学的改革和发展,都有现实的意义和启示。

原因之一,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最大的困难,自然缘自它们多半是远离“经济基础”、漂浮在空中的“上层建筑”,本身对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必然要求高等教育都要适应这个现实需求。为这个现实服务,肯定是高等学校包括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在内责无旁贷的。但是,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说到底还是“文化”性、精神性、学术性的学科、专业,服务现实还必须思考和研究这“服务”的目标、途径、方式、渠道、形式、角度、侧重、分工等等问题。这是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改革难的主要的客观原因。从不适应到适应,这个“过程”的长短,既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及其所能提供的条件,也取决于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改革内驱力和适应力。简单地将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推向市场”,让它自生自灭、“自然淘汰”,显然没有抓住要害,也解决不了问题。

其二,传统基础文科在大学特别是综合大学中,历史相对较长久,学科专业基础相对较雄厚,教学大纲、学术梯队、学术研究、学科建设都较系统,呈现一种金字塔式的扎实和稳定。同时,这种“凝固”学术氛围及两千年来的“经学传统”的潜移默化,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时候,往往会助长固步自封、不思变革的思维定势,阻碍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同仁迈出改革的脚步。这是内在阻力和障碍。

其三,我国大学学科划分与建设,几十年来一直受前苏联模式影响,条块分割,对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位置和改革发展,缺乏整体高度的思考和投入;而近二十年,全国高等学校数量大增,各地各系统各自为政,互相攀比,重复建设,总想发展“大而全”、“小而全”,不顾条件和需要,升格“大学”,争办文科,这无疑更加剧了条件和生源的不合理竞争,低水平重复,也无异于对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改革发展釜底抽薪。如果不在综合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上下功夫,理顺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教与研的关系,建立适应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特点的评价制度,在新一轮综合大学的改革中,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也可能再次失去改革发展机遇。此外,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学术队伍往往偏于老化,中、老

年教学研究人员多半经历过“文革”及大搞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时期,文化、学术、思想上的动辄获咎记忆,也从意识深层干扰着他们责任感、参与和变革之心的发挥。面对如此“精彩”的现实世界,真正能坐得“冷板凳”的年轻人又能有几人?这必然导致“青黄不接”,既影响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发展,也增加了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改革的难度。

二、办法探索

俗话说,“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只要综合大学的领导者、领导综合大学者能够真正从“科教兴国”的高度来认识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地位、作用,综合大学文科的教师研究人员能从这个全局来理解和承担自己的责任,认清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问题、困难所在,就一定能够找到以改革促发展、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办法。

一、要把握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学科特点,因势利导,方能见效。虽然不能说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都不接触现实问题(如“真理标准”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就很有现实性),但必须承认,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特点、“本行”和长处,不是在直接的应用和实用性上,而是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培养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方面,在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根据、文化基础和智力支持方面。对于用古今中外的、人类的历史优秀文化遗产教育人培养人方面,在促进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和融合、振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在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优秀成果等方面,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基础研究,更像是数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命题,虽然一时不能直接转化为“商品”,但却标志人类文明程度、认识力和“生产力”的水平。从世界上著名的综合大学来看,多以自己拥有多少世界级人文科学家来说明自己的学术实力,就像它们往往炫耀自己培养出多少总统、部长一样。在培养文化巨人这一点上,我国的大学虽然不必以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可以继承而自傲,但也决不能因为国家近代的落后而产生文化的自卑。要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文化上没有继承与发展,肯定是没有前途的。这就是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

二、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改革发展问题,要靠“国家”来解决。既然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作用在长远,有益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精神之弘扬,那它的生存、发展问题就应该由国家来统筹解决。在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包括我们的大学校长,代表的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文化要求。这是“三个代

表”重要理论在办学思路和治校水平上的体现,自然也应该体现在对于文、理基础学科的规划管理上。只有那些急功近利的短视者,才会放弃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责任。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教育、科研的“产品”(如高级文教人才和人文学术成果),应该由国家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来认可和“购买”,而不应该简单地“推向市场”,让其自生自灭。如果说这也是“市场经济”的话,这个市场就应该既是“买方市场”,又是“卖方市场”。国家及其代表者,应该对这种文教的“产业”进行必要的规划、管理、调控、投入、考核。具体来说,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应该保持怎样的地位和规模,地区分布和优势集中怎样合理平衡,政策、措施、条件、资源应该怎样制订和配置,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与应用、新兴、交叉的学科关系怎样处理等等,都需要统筹兼顾。如果说这是“计划经济”的话,国家对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的改革与发展倒是需要纳入“计划”来解决。教育部设计和实施的“重点社科研究基地”计划及其重点投入办法,对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起到了重大的示范作用。这是“制度创新”的最具价值的成果,代表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教育部历来注意人文基础研究与社科应用研究并重的规划原则,已经启动的包含基础研究的“重大攻关项目”计划,对于整个高校社科包括传统基础学科的改革与提高,具有很强的示范和拉动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综合大学传统基础文科不但在当前综合大学正在探索的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中大有可为,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从改革和创新中做出贡献,也是大有可为的。

三、在评价上,对传统基础学科进行社会效果和学术创新相统一的指标体系。评价,就是指挥棒和风向标。在社会科学中,最不宜用量化指标来评价的,大约就是人文学科了。众所周知,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主要目标是传承文明,对现实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作用,因而直接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是难于量化表达的。又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中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国的人文学术和文化创新,必然有自己民族化的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标准。而我国高校特别是综合大学的人文学科,责无旁贷应该在订立和规范这种标准问题上有所创新、有所贡献。当然,人文学科的学术评价,还有个难点在量化问题上。比如,对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工作量、成果数与其创新性和学术的重要性,不消说并没有一个对应关系,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不见得其价值比一本学术专著就低,他的学术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他发表了多少字的成果。对于学术论文来说,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严格说来并不说明其水平和质量。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们思考高校人文学科问题时必须有所约定的。这个问题也有其“专门”性,留给评价专家去探索解决吧,这里不再赘述。

三、改革措施

90年代以来,称为综合大学的高校,包括自己建设文科的和并入文科的,都将文科的振兴和发展提上日程。而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内部关系,即是传统基础文科与新兴应用文科的关系。自己建设文科的学校好办,可以根据全国高校学科分工和本校的条件和社会的需要,白手起家,轻重取舍都能自主。而原本就有或并入文科的综合大学,对于人文学科的地位和改革发展思路就必须清楚、可行。

从人文社会科学适应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大学的总体目标的要求来说,从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科学的三次讲话提出的要求来说,应该立足于发扬综合高校人文学科的传统优势,突出各校社科特点,加强规划引导,加大社科投入,同时增强人文学科的“服务”意识,发展交叉研究,以相关重点基地为核心,组织精干高效的人文学科的学术队伍,做出一批标志性“精品”成果,促进和实现整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繁荣。

对于综合大学的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来说,当务之急是:

1、增强“精品”意识,在努力提高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总量的同时,做出一批具有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综合大学要重点扶持那些历史形成的、基础深厚的、有传统优势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使这些学科和领域在过去已经取得的领先成果基础上,继续加深和拓宽学术研究领域,进入“保护、适应、改革、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高校文科发展的先导和支柱;加大对这些学科、领域的投入,千方百计创造和提供条件,使基础研究人员能集中精力,从事具有代表高校水平的“精品”和标志性成果的生产,做出一批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重大成果、“拳头”产品,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大师”级专家,提升大学文科的优势地位和学术声誉。这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目标。

2、综合大学的文科要增强“现实感”和“服务意识”,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在为党和国家服务,以及为省、市地方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中发挥多学科优势,做出切实的贡献,以自己的服务成绩争取到应有的地位。高校是整个文科都要增强“现实感”和“服务意识”,要改变文科“埋头著述”的习惯,真正着眼于现实需要,着眼于为省、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寻找并找到自己产品的“市场”和“销路”。要改革对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向非高校的那些研究现实问题的同行学习,要逐步走出高校社科联系实际、服务现实的较稳定的渠道和路子,从根本上改变高校社科应用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有高校深厚的基础研究和理论素养作基础,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在实践中

将得到发展,与基础研究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共同提高,促进高校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

3、加大社科投入,扩大横向联系,多方争取支持,建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改革与发展基金,改善科研条件,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改革和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综合大学应该逐步加大对社科的投入,建立学校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改革与发展基金,以拉动本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打消“等、靠、要”幻想,广泛开展横向联系,通过各种方式广交朋友,寻找合作伙伴,通过为社会服务,通过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出谋划策,吸引社会对学校社会科学的支持。通过校友会、校董会的校友、朋友,联系各界各层次热心人士,为学校争取帮助和支持。综合大学要扩大海外交流,“走出去”、“请进来”,沟通信息,以高水平的成果和严格的管理,争取海外学术文化基金项目和支持。利用综合大学校友遍及东南西北,又有与海内外广泛交流的历史传统和人缘条件,通过正确引导,放宽政策,在横向联系和争取社会支持方面做出成绩,使之成为本校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持力量。

以上这些措施和办法,既是老的综合大学对自己管理实践的总结,也是我们对所有综合大学的传统基础学科改革的思考。总之,各高校有自己的具体情况,有自己的优势和条件,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关键是找到自己的目标和行之有效的途径和办法。

〔责任编辑:袁玉立〕

本刊讯 12月26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们以及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老一辈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继续谱写下去。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胡锦涛最后指出,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国家,中国人民是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伟大人民,中华民族是有着自强不息精神的伟大民族。只要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开辟的广阔道路不断前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风险和挑战都可以战胜,我们一定能胜利地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彼岸。